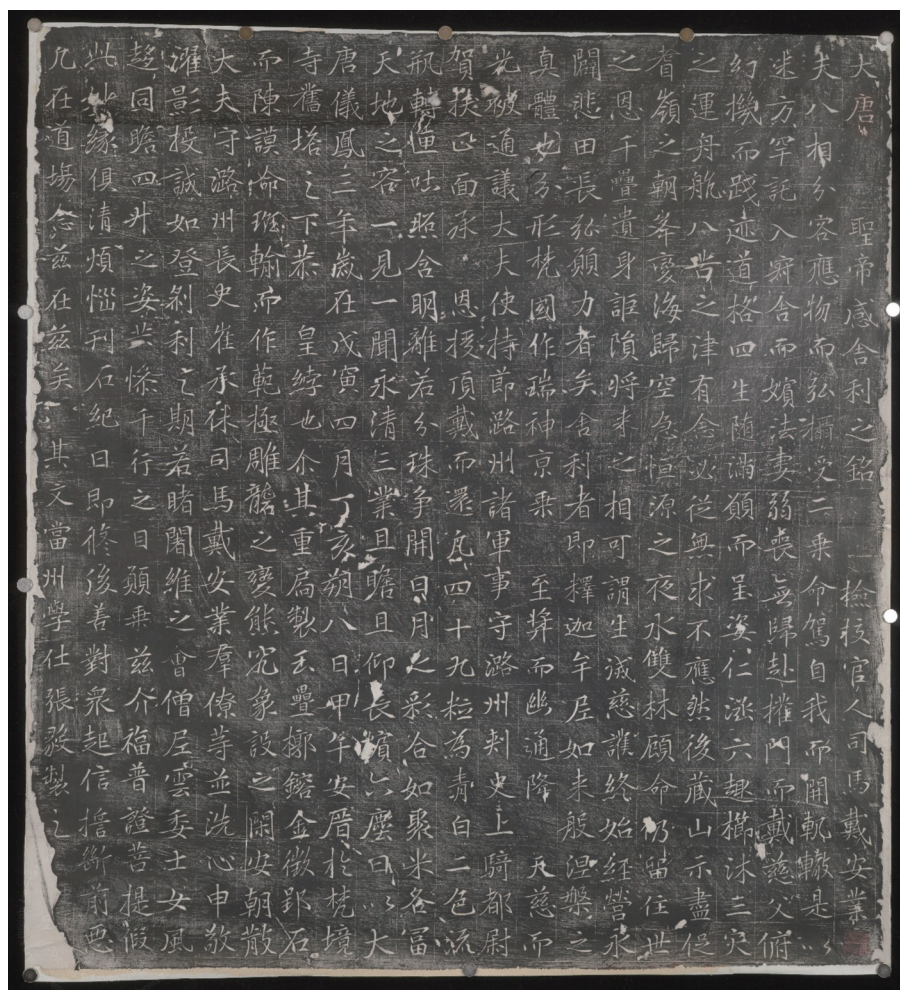


武則天與阿育王—— 儀鳳年間舍利頒布與《大雲經疏》



梵境寺〈大唐聖帝感舍利之銘〉拓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大西磨希子

日本佛教大學佛教學部

古今論衡 第 37 期 2021.12

一、前言

敦煌寫本《大雲經疏》中記載：「神皇先發弘願造八百四萬舍利寶塔，以光宅坊中所得舍利分布於四天下。」其中所寫的光宅坊位於長安城朱雀街街東第三街從北第一坊。與這條記載有關的舍利塔還未發現，而相關的文獻記錄又十分有限，因此很難弄清其真實情況。但是，從時間順序上來看，武則天於光宅坊感得舍利後頒布天下這一事件，正在於七世紀初隋文帝仁壽年間建造舍利塔，和十世紀後期吳越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這兩個歷史事件之間。另外，日本稱德天皇在寶龜元年（770）奉獻百萬塔陀羅尼分置十大寺，雖不是釋迦牟尼佛的真身舍利，而是將陀羅尼視為法身舍利安置塔中，但仍可能受此影響。因此，從王權頒布舍利及建塔的角度來考慮武則天的事業具有不可忽視的歷史意義。尤其武則天利用佛教證明其統治的合法性，以一介女身發動武周革命，最終成為中國歷史唯一一位君臨天下的女皇帝。因此，將光宅坊所感得之舍利頒布天下，特意藉《大雲經疏》說明此事業乃是基於其先前所發誓願，這對於武則天以及武周王朝一定有某種重要意義。

關於武則天頒布光宅坊所感得的舍利，陳金華和高瀨奈津子兩位學者很早就關注這個議題，並已取得了許多研究成果。他們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武則天與隋文帝在建塔事業上的關係與異同，以及前者頒布舍利的政治意圖等重要訊息。^①但是從《大雲經疏》的記載，我們不禁想問：在頒布光宅坊感得舍利之前，為何武則天先發願造「八百四萬舍利寶塔」？陳先生和高瀨先生都以為這是根據阿育王建立八萬四千舍利塔的故事，陳先生只是指出武則天發願造塔的數量較阿育王增加了大約百倍，高瀨先生亦僅僅認為這是武則天將自己比擬阿育王。然而，其時人視武則天的身份遠勝阿育王，該記載當是為了解說明此事而特意被插入的。

本文就儀鳳年間光宅坊感得舍利頒布一事，利用新得拓本，在考證相關史料的基礎上，對《大雲經疏》中武則天發願造立八百四萬舍利塔的含義進行考察。

* 本文係日本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則天武后期の佛教美術に関する研究」（課題號碼：19K00183）的成果之一，又得到中華民國外交部二〇一九年「臺灣獎助金」（編號：MOFATF20190053）的贊助與支持。初稿的中文翻譯得到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馬歌陽博士生的協助，曾在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於中興大學舉辦之「第13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文學與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增訂後承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獎助生徐嘉俊先生的中文校對與修潤，併此敬致謝忱。

① Chen Jinhua (陳金華), *Monks and Monarchs, Kinship and Kingship: Tanqian in Sui Buddhism and Politics* (Kyoto: Scuola Italian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 2002), pp. 123-128, 146-147. 高瀨奈津子，〈則天武后による儀鳳の舍利頒布—山西潞州の梵境寺儀鳳三年舍利塔銘をてがかりに—〉，氣賀澤保規編，《隋唐佛教社會の基層構造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5），頁174-192。

二、《大雲經疏》所載的八百四萬舍利塔的建造發願與光宅坊感得舍利的頒布

敦煌寫本 S.2658 和 S.6502 均首尾缺失，難以確定原題，由於其內容為《大雲經》（一名《大方等無想經》）的注疏，一般遂稱為《大雲經疏》。這部經疏與一般佛經注疏不同，因與武則天登基有關，帶有濃厚的讖書性質。矢吹慶輝先生做了 S.2658 全文的錄文，並稱為《武后登極讖疏》，^② 近年來也有不少學者將永超撰《東域傳燈目錄》載「大雲經神皇授記義疏一卷」視為其原來的題名，稱之為《大雲經神皇授記義疏》。^③

以上兩個敦煌寫本雖然用字略有不同，但是屬同一個文本，其中 S.6502 的殘存行數比 S.2658 多，而且前者中包含了與後者相對應的所有部分，故以下考察皆以 S.6502 為主來進行。寫本中有關武則天向天下頒布長安光宅坊所感得的舍利及發願造立八百四萬舍利塔的錄文，如下第 115 行「經曰」至第 132 行「之驗也」（「天」「載」「正」「初」原文作為則天新字，在此均改為正字）：

- 115 神皇聖德也 經曰舍利不可得假使蚊子
116 脚堪任作橋梁能度一切眾舍利乃可得假使
117 水中蛭忽然生白齒大如香象牙舍利乃可
118 得假使菟生角堪任作梯橙高至淨居天舍
119 利乃可得假使小舟船能載須彌山度於大
120 海水舍利乃可得如此譬喻其數寔多明知如
121 來舍利不可得也又經記云王閻浮提護持
122 正法大得舍利為欲供養佛舍利故遍閻浮
123 提起七寶塔恭敬供養尊重讚歎見有護法
124 持淨戒者供養恭敬見有破戒毀正法等呵

② 矢吹慶輝，《三階教之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27），第三部附篇「二、大雲經と武周革命」，頁 686-694。

③ 湯用彤，〈矢吹慶輝《三階教之研究》跋〉，《微妙聲》3（1937）：9-11。滋野井恬，〈敦煌本《大雲經疏》の研究〉，《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1.2（1973）：836-841。牧田諦亮，〈中國佛教における疑經研究序說——敦煌出土疑經類をめぐって〉，《東方學報》（京都）35（1964）：337-396。牧田諦亮，《疑經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6），後收入《牧田諦亮著作集 第一卷 疑經研究》（京都：臨川書店，2014）。Antonino Forte（富安敦），*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Napoli: In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76; 2nd ed., Kyoto: Scuola Italian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 2005) 等。除此之外，富安敦還有以下的考證：アントニーノ・フォルテ，〈《大雲經疏》をめぐって〉，牧田諦亮、福井文雅編，《講座敦煌 7 敦煌と中國佛教》（東京：大東出版社，1984），頁 173-206。

- 125 責毀辱今 神皇臨馭天下頻得舍利前
126 開祥於光宅今表應於載初故廣武銘云光
127 宅四天下八表一時至者即明
128 神皇先發弘願造八百四萬舍利寶塔以光
129 宅坊中所得舍利分布於四天下此則顯八
130 表一時下舍利之應斯乃不假人力所建並
131 是八表神功共成此即顯護持正法大得舍
132 利之驗也 經曰教化所屬城邑聚落

將其中有關部分抽出，去掉空格，標注句讀，並加注《大雲經》經文出處，則如下所示：

經曰：「舍利不可得。假使蚊子腳，堪任作橋樑，能度一切衆，舍利乃可得。假使水中蛭，忽然生白齒，大如香象牙，舍利乃可得。假使菟生角，堪任作梯橙，高至淨居天，舍利乃可得。」^④「假使小舟船，能載須彌山，度於大海水，舍利乃可得。」^⑤如此譬喻，其數寔多。明知如來舍利不可得也。

又經記云：「王閻浮提，護持正法，大得舍利。」^⑥「爲欲供養佛舍利故，遍閻浮提起七寶塔。」^⑦「恭敬供養，尊重讚歎。」^⑧「見有護法持淨戒者、供養恭敬。見有破戒毀正法等，呵責毀辱。」^⑨

今神皇臨馭天下，頻得舍利，前開祥於光宅，今表應於載初。故《廣武銘》云：「光宅四天下，八表一時至」者，即明神皇先發弘願，造八百四萬舍利寶塔，以光宅坊中所得舍利分布於四天下，此則顯八表一時，下舍利之應。斯乃不假人力所建，並是八表神功共成。此即顯護持正法，大得舍利之驗也。

這裡不僅引用了《大雲經》中有關舍利難得的文字，而與原文的前後順序無關，從經文的其他部分還摘選了君臨閻浮提、護持正法、獲得大量舍利，以及爲了供養舍利而在閻浮提各處建立七寶塔的文字。這些經文是作爲未來之事的懸記；若然，武則天君

④ 出自卷四：《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以下略稱《大正藏》），第12冊，頁1096下，行19-25。
⑤ 出自卷四：《大正藏》第12冊，頁1097上，行7-8。
⑥ 出自卷四：《大正藏》第12冊，頁1297下，行25-26的經文「於閻浮提得大自在，護持正法大師子吼，爲法流布大得舍利」之輯要。
⑦ 出自卷六：《大正藏》第12冊，頁1107上，行18-19。
⑧ 出自卷六：《大正藏》第12冊，頁1107上，行24-25。「恭敬供養，尊重讚歎。」之句亦出於卷四（《大正藏》第12冊，頁1096上，行23）和卷五（《大正藏》第12冊，頁1100上，行8-9）。可是《大雲經疏》僅引用該經的卷四與卷六，因此難以認定出自於卷五，並且從前後引文的關係來看，應當出自上述卷六。
⑨ 出自卷六：《大正藏》第12冊，頁1107上，行20-21。

臨天下之後，頻繁感得舍利，先發願造立八百四萬舍利塔，並將光宅坊所得舍利頒布於四天下，都可以解釋為這些預言的應驗。

關於《大雲經疏》的記載，林世田先生認為，未聞佛舍利有超過萬數，因此可斷定光宅坊出土萬餘舍利之事為偽造，加之，精明過人的武則天當年絕對不可能發願造八百四萬舍利寶塔，這也是明顯的詐偽。^⑩

陳金華先生於林先生刊登論文的同年出版專書，書中對於《大雲經疏》中「神皇先發弘願造八百四萬舍利寶塔」這一記載，解釋為武則天前世所預見的內容，並指出這明顯是根據阿育王建立八萬四千塔的傳說，惟其更具雄心，數目達到了近百倍之多。^⑪而對於「以光宅坊中所得舍利分布於四天下」，陳先生依據《山右石刻叢編》卷四所收梵境寺〈大唐聖帝感舍利之銘〉及《宋高僧傳》卷二六〈法成傳〉，認為光宅坊所感得之舍利，確實於儀鳳三年（678）頒布。^⑫陳先生還指出，武則天之頒布舍利應受到隋文帝在仁壽年間進行之建塔事業的啟迪，兩位同為有著血緣關係的篡位者，同樣追求扮演菩薩天子和佛教理想君主之轉輪聖王。^⑬在此基礎上，陳先生還特別留意到梵境寺乃是隋文帝在仁壽二年（602）建造舍利塔之地，並在佛誕節於該處舉行供養舍利的法會；而文帝在仁壽二年及仁壽四年頒布舍利，同樣是在佛誕節這天。據此，陳先生指出武則天之發願建塔、頒布舍利應為模仿隋文帝仁壽年間建塔的故事，而其他州的供養儀式也在同一日期舉行的可能性極高。^⑭

如是，陳先生首先關注梵境寺〈大唐聖帝感舍利之銘〉，考證了武則天頒布舍利一事為史實，並藉由隋文帝故事為參照，討論其意義。不過，陳先生沒有採錄梵境寺〈大唐聖帝感舍利之銘〉等史料的原文。

此外，高瀨奈津子先生也在調查近代以前山西東南地區地方志所載有關佛教寺院和石刻時，注意到順治年間編纂的《潞安府志》卷八〈建安置志〉所記梵境寺〈大唐聖帝感舍利之銘〉；而光緒年間的《長治縣志》卷四〈金石志〉和《山右石刻叢編》卷四亦收錄該文。高瀨先生介紹全文、加以訓讀，並考察儀鳳年間的舍利頒布與武則天的關係，及其時佛教教團所扮演的角色。^⑮對於《大雲經疏》有關此事的記載，高瀨

⑩ 林世田，〈武則天稱帝與圖讖祥瑞——以 S.6502《大雲經疏》為中心〉，《敦煌學輯刊》2002.2：64-72。

⑪ Chen Jinhua, *Monks and Monarchs, Kinship and Kingship: Tanqian in Sui Buddhism and Politics*, pp. 127-128.

⑫ Chen Jinhua, *Monks and Monarchs, Kinship and Kingship: Tanqian in Sui Buddhism and Politics*, pp. 122-125.《山右石刻叢編》卷四所收梵境寺〈大唐聖帝感舍利之銘〉（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頁15012）。《宋高僧傳》卷二六，〈法成傳〉（《大正藏》第50冊，頁872下-873上）。

⑬ Chen Jinhua, *Monks and Monarchs, Kinship and Kingship: Tanqian in Sui Buddhism and Politics*, pp. 112-114.

⑭ Chen Jinhua, *Monks and Monarchs, Kinship and Kingship: Tanqian in Sui Buddhism and Politics*, pp. 124-125.

⑮ 高瀨奈津子，〈則天武后による儀鳳の舍利頒布——山西潞州の梵境寺儀鳳三年舍利塔銘をてがかりに——〉，頁174-192。高瀨先生似乎未參考陳金華先生的論文，故認為此舍利塔銘是「迄今為止不為人所知的史料」。高瀨先生指出，光緒年間的《長治縣志》卷四〈金石志〉中還收錄了隋仁壽二年（602）的舍利塔銘及儀鳳三年（678）的舍利塔銘，在《山右石刻叢編》卷三和卷四中也分別收錄了仁壽二年的舍利塔銘和儀鳳三年的舍利塔銘，由此可知隋唐時期梵境寺曾兩次頒布舍利。其中仁壽二年的舍利塔銘的拓片，以〈隋潞

先生認為「《大雲經疏》寫道武后先立誓拯救衆生，後在全國建舍利塔，並將在光宅坊感得到的舍利頒布於全國」，¹⁶而將儀鳳年間頒布舍利以及《大雲經疏》有關此事的記述，均看作實際執政的武后以阿育王來比擬一己的事業。¹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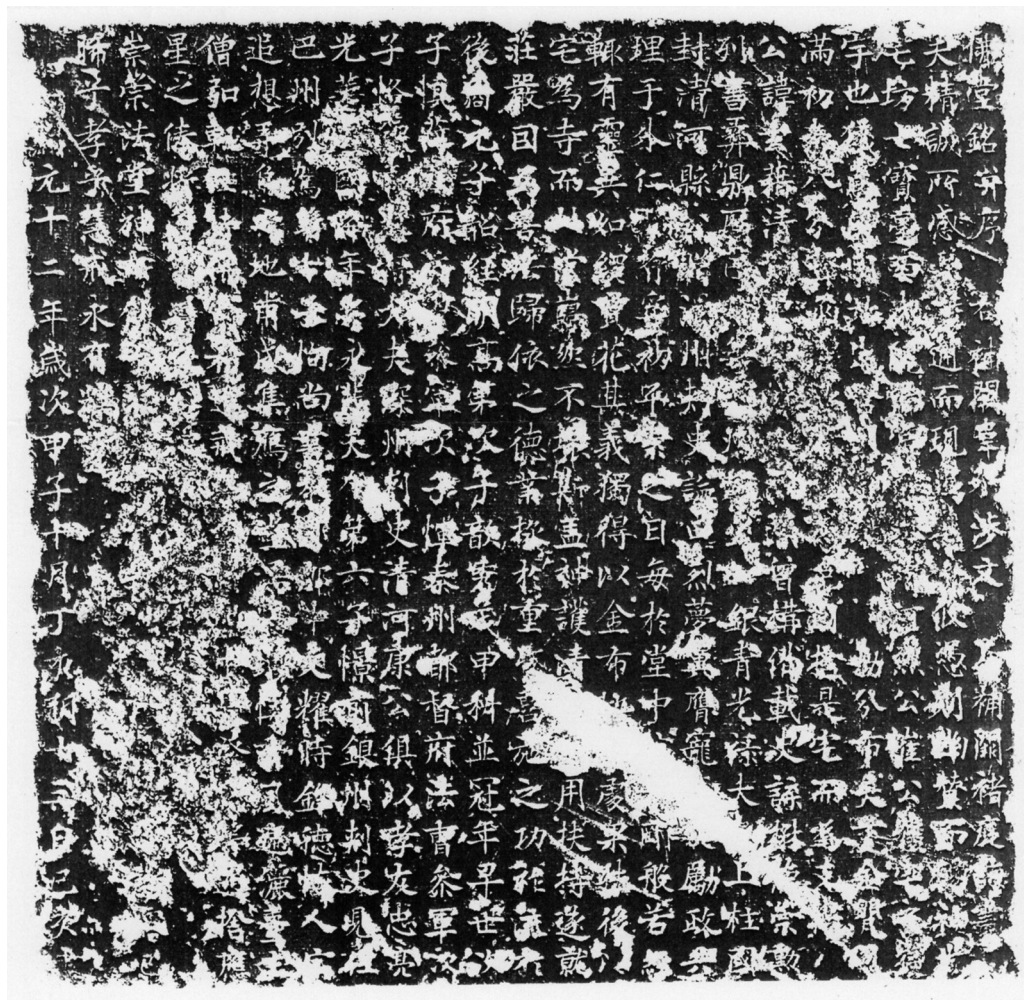
總之，我們可以認定光宅坊所感得的佛舍利確實於儀鳳年間頒布於全國。與此相關，西安碑林博物館所藏的開元十二年（724）〈佛堂銘并序〉（圖一），亦可作為旁證。¹⁸〈佛堂銘并序〉為方形石刻，長 49.0 公分，寬 53.0 公分，厚 13.5 公分，共 23 行，每行 22 字，其中第 1 行至第 5 行云（未判讀之字以□表示）：

- 1 佛堂銘并序 右補闕韋利涉文□補闕褚庭誨書¹⁹
- 2 夫精誠所感，□□通而現□。□□攸²⁰憑，則²¹幽贊而錫²²。光
- 3 宅坊七寶臺西□院□（佛²²）堂²³□□清²⁴河烈公崔公舊宅之寢
- 4 宇也。儀鳳□□□出舍利□□²⁵，勅分²⁶布天²⁷下²⁷，金□□
- 5 滿初□八分²⁸□²⁹函□□□□□³⁰色，因³¹捨是宅而為支提□

〈佛堂銘并序〉載清河崔公（即崔玄籍）喜捨舊宅的寢宇而建造佛堂於光宅坊七寶臺。由於光宅坊在儀鳳二年出現舍利，七寶臺乃是為了紀念這一靈驗而建造，故銘文第 4 行提到舍利之出土以及「勅分布天下」。儘管不少文字因毀損嚴重而致無法判讀，但〈佛堂銘并序〉已可證實光宅坊感得舍利頒布天下一事。

州壺關縣梵境寺舍利塔銘〉的名稱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登錄號：01372），以〈潯州壺關縣梵境寺舍利塔銘〉（登錄號：stone0002793）藏於臺北國家圖書館。

- ¹⁶ 高瀬奈津子，〈則天武后による儀鳳の舍利頒布—山西潯州の梵境寺儀鳳三年舍利塔銘をてがかりに—〉，頁 189。
- ¹⁷ 高瀬奈津子，〈則天武后による儀鳳の舍利頒布—山西潯州の梵境寺儀鳳三年舍利塔銘をてがかりに—〉，頁 191。
- ¹⁸ 傅清音、張安興，〈新見《佛堂銘》中含宅為寺及佛教靈驗敘事淺析〉，《文博》2013.6：89-93。趙力光主編，《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續編》上冊（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14，以下略稱為《墓誌續編》），頁 265-266。〈佛堂銘并序〉於二〇一一年六月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館。
- ¹⁹ 擔任書寫的褚庭誨，與李憲（睿宗的嫡長子）之子汝陽王李璿親善，見於《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九五，〈讓皇帝李憲傳〉，頁 3014 和《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八一，〈讓皇帝李憲傳〉，頁 3599。
- ²⁰ 「攸」，傅清音、張安興二人作「後」。
- ²¹ 「則」，傅、張二人作「刻」。
- ²² 關於這個字，傅、張二人和《墓誌續編》中都未讀，但〈佛堂銘并序〉這一題目中出現了「佛堂」，因此可以推斷為「佛」字。
- ²³ 「堂」，傅、張二人作「□」，《墓誌續編》作「堂」。
- ²⁴ 「清」，《墓誌續編》判讀為「清」。
- ²⁵ 傅、張二人作「□□」，《墓誌續編》則未判讀，不過根據拓本可知這裡有兩個字的空格。
- ²⁶ 「分」，傅、張二人作「兮」。
- ²⁷ 「天^下」，《墓誌續編》作「□□」。
- ²⁸ 「分」，傅、張二人作「兮」。
- ²⁹ 「□」，《墓誌續編》作「寶」。
- ³⁰ 「□」，《墓誌續編》作「為」。
- ³¹ 「因」，《墓誌續編》作「因」。



圖一：開元十二年（724）〈佛堂銘并序〉拓本（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引自：趙力光主編，《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續編》上冊，頁265，圖84）

三、儀鳳年間光宅坊感得舍利及其頒布諸州

唐高宗儀鳳二年（677）於長安光宅坊發現舍利，對此《唐會要》卷四八〈光宅寺〉條云：

光宅坊。儀鳳二年，望氣者言：「此坊有異氣。」勅令掘，得石罍³²，得舍利萬粒。遂於此地立為寺。³³

³²「罍」，《文淵閣四庫全書》作「留」：「光宅寺。在光宅坊。儀鳳二年望氣者言，『此坊有異氣。』敕令掘得石留，得舍利萬粒。遂於此地立為寺。」（《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622下）。

³³《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四八，〈寺〉，頁991。《長安志》卷八也有相同的記載，即「橫街之北，光宅寺。儀鳳二年，望氣者言，『此坊有興氣。』勅令掘得石函。函內有佛舍利骨萬餘粒。遂立光宅寺。武太后始置七寶臺，因改寺額焉。」（《宋元方志叢刊》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113下）。

《宋高僧傳》卷二六〈周京師法成傳〉也記載了同樣的事件，惟添加了更多有趣的細節：

釋法成，本姓王，名守慎，官至監察御史。屬天后猜貳，信酷吏羅織，乃避法官、乞出家為僧。苦節勤於化導。……儀鳳二年，望氣者云：「此坊有異氣。」勅掘之，得石函。函內貯佛舍利萬餘粒，光色粲爛而堅剛。勅於此處造光宅寺，仍散舍利於京寺及諸州府，各四十九粒。武后於此始置七寶臺，遂改寺額。³⁴

可知，儀鳳二年在光宅坊有「異氣」，下敕令發掘，由此發現裝有一萬餘粒舍利的石函，後將發現的舍利向在京諸寺及天下諸州府各頒布四十九粒。

正如陳金華和高瀨奈津子兩位先生所指出的，潞州（現山西省長治市）梵境寺的〈大唐聖帝感舍利之銘〉可作佐證。值得一提的是，他們都依據清代的《山右石刻叢編》等書所錄的銘文，³⁵其實該銘文的拓片仍然存世（圖二）。³⁶拓片高 63.5 公分，寬 58.0 公分，有方形界格，行書，共 21 行，每行滿格 23 字，茲逐錄於下：

- 1 大唐 聖帝感舍利之銘 檢校官人司馬戴安業
- 2 夫八相分容應物而弘³⁷攝受二乘命駕自我而開軌轍是以
- 3 迷方罕託入寂舍而嬪法妻弱喪無歸赴權門而戴慈父俯
- 4 幻機而踐迹道格四生隨滿願而呈姿仁涵六趣櫛沐三灾
- 5 之運舟航八苦之津有念必從無求不應然後藏山示盡促
- 6 耆嶺之朝峯變海歸空急恆源之夜水雙林顧命仍留住世
- 7 之恩千疊遺身詎隕將來之相可謂生滅慈護終始經營永
- 8 闢悲田長弘³⁸願力者矣舍利者即釋迦牟尼如來般涅槃之
- 9 真體也分形梵國作瑞神京乘 至獎而幽通降 天慈而
- 10 光被通議大夫使持節潞州諸軍事守潞州刺史上騎都尉
- 11 賀拔正面承 恩授頂戴而還凡四十九粒為青白二色流

³⁴ 《大正藏》第 50 冊，頁 872 下-873 上。

³⁵ 陳金華先生僅提銘文標題及其相關內容，並沒引用銘文。高瀨先生則著錄全文，但由於依據的是清代的著錄，沿襲了清代因避諱而改的別字，詳見注 37。

³⁶ 該拓片與釋文至今未曾出版。依目前筆者管見所及，共有如下三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梵境寺舍利塔銘〉（登錄號：00920）；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大唐聖帝舍利之銘〉（登錄號：TOU0614X）；中國國家圖書館〈舍利塔銘〉（館藏號：章專 863）。傅斯年圖書館藏的一件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顏娟英先生提示，謹致謝忱。

³⁷ 「弘」，乾隆二十八年吳九齡修，蔡履豫纂，《長治縣志》卷四〈金石志〉（以下略稱《長治縣志》）作「宏」，據此高瀨也同作「宏」，但這應當是為了避清高宗弘曆名諱。

³⁸ 《長治縣志》和高瀨均作「宏」，可能理由同上。

- 12 瓶轉匣吐照含明離若分珠爭開日月之彩合如聚米各富
- 13 天地之容一見一聞永清三業且瞻且仰長擯六塵曰以大
- 14 唐儀鳳三年歲在戊寅四月丁亥朔八日甲午安厝於梵境
- 15 寺舊塔之下恭 皇綽也尔其重扁³⁹製玉疊槲鎔金徵郢石
- 16 而陳謨命班輸而作範極雕礬之變態究象設之閑安朝散
- 17 大夫守潞州長史崔承休司馬戴安業羣僚等並洗心中敬
- 18 濯影投誠如登剎⁴⁰利之期若睹闍維之會僧尼雲委士女風
- 19 趨同瞻四升之姿共慘千行之目願乘茲介福普證菩提假
- 20 此妙緣俱清煩惱刊石紀日即修後善對眾起信誓斷前惡
- 21 凡在道場念茲在茲矣 其文當州學仕張毅製之

據此省略空格並進行句讀如下：

〈大唐聖帝感舍利之銘〉檢校官人司馬戴安業

夫八相分容，應物而弘，攝受二乘，命駕自我，而開軌轍。是以迷方罕託，入寂舍而嬪法妻；弱喪無歸，赴權門而戴慈父。俯幻機而踐迹，道格四生；隨滿願而呈姿，仁涵六趣。櫛沐三灾之運，舟航八苦之津。有念必從，無求不應。然後藏山示盡，促耆嶺之朝峯；變海歸空，急恆源之夜水。雙林顧命，仍留住世之恩；千疊遺身，詎隕將來之相。可謂生滅慈護，終始經營；永闢悲田，長弘願力者矣。

舍利者，即釋迦牟尼如來般涅槃之真體也。分形梵國，作瑞神京。乘至獎而幽通，降天慈而光被。

通議大夫、使持節、潞州諸軍事、守潞州刺史、上騎都尉賀拔正，面承恩授，頂戴而還。凡四十九粒，為青白二色。流瓶轉匣，吐照含明。離若分珠，爭開日月之彩；合如聚米，各富天地之容。一見一聞，永清三業；且瞻且仰，長擯六塵。曰：

以大唐儀鳳三年，歲在戊寅，四月丁亥朔八日甲午，安厝於梵境寺舊塔之下，恭皇綽也。尔其重扁製玉，疊槲鎔金。徵郢石而陳謨；命班輸而作範。極雕礬之變態；究象設之閑安。朝散大夫、守潞州長史崔承休，司馬戴安業，羣僚等，並洗心中敬，濯影投誠。如登剎利之期，若睹闍維之會。僧尼雲委，士女風趨。同瞻四升之姿；共慘千行之目。願乘茲介福，普證菩提，假此妙緣，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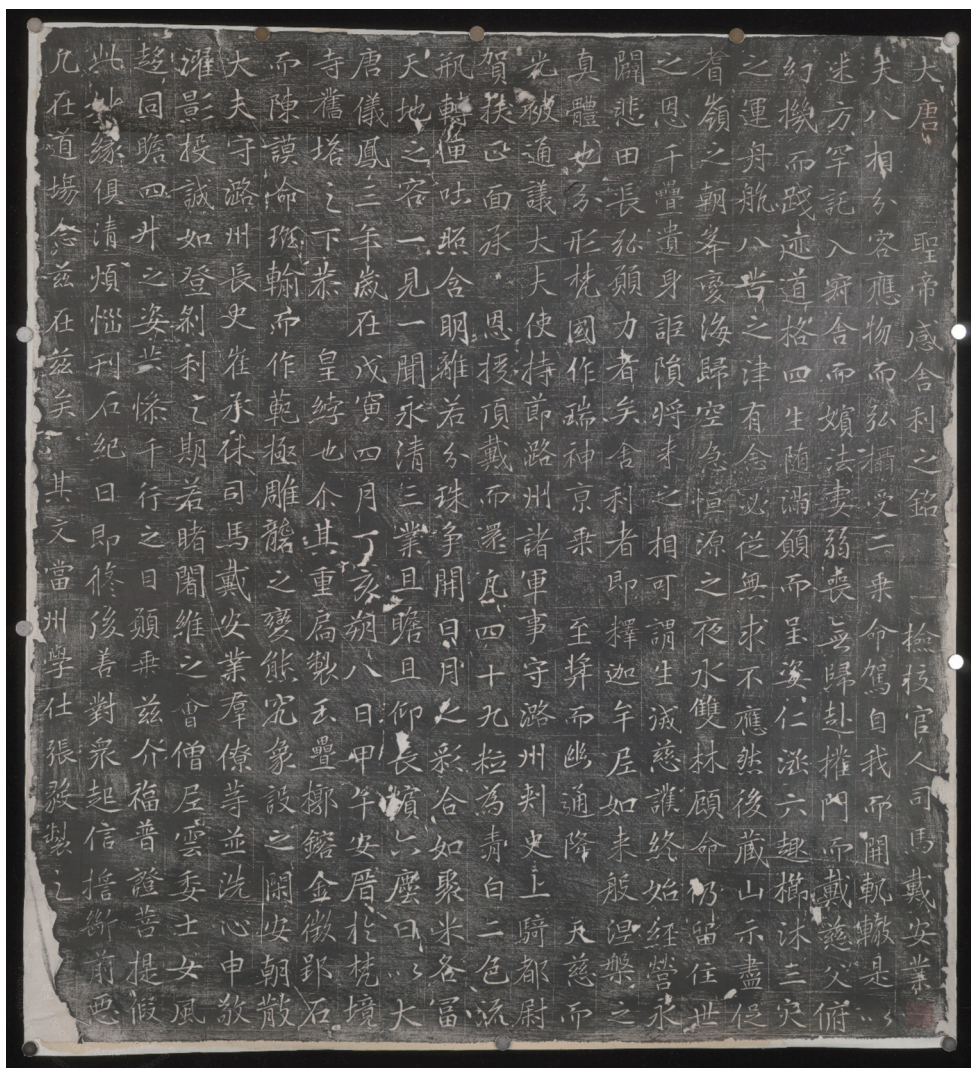
³⁹「扁」高瀨作「局」。此承蒙南華大學文學系鄭阿財先生的指正，敬申謝忱。

⁴⁰《長治縣志》和高瀨均作「剎」。

清煩惱。刊石紀日，即修後善，對眾起信，誓斷前惡。凡在道場，念茲在茲矣。

其文當州學仕張毅製之。

〈大唐聖帝感舍利之銘〉可分前後兩部分：前面以佛教詞彙敘述佛舍利的由來和意義；後面部分記載佛舍利出現於長安之靈瑞，潞州刺史賀拔正領受其中四十九粒攜回本州，以及儀鳳三年四月八日在梵境寺舊塔舉行安置儀式及其願文等內容。可知，此時潞州所領受的佛舍利數量，恰好與前引《宋高僧傳》卷二六〈周京師法成傳〉所載「散舍利於京寺及諸州府，各四十九粒」吻合。加之，〈大唐聖帝感舍利之銘〉記錄了佛舍利頒布如何進行，以及潞州如何供養舍利等具體情況，故而這不僅是證實儀鳳年間舍利頒布的一手資料，還是研究此政教活動的一級資料。⁴¹



圖二：梵境寺〈大唐聖帝感舍利之銘〉拓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⁴¹ 關於〈大唐聖帝感舍利之銘〉所載儀鳳年間舍利頒布的分析，參見拙稿〈儀鳳年間的舍利頒布〉，《唐代史研究》24（2021，待刊）。

四、「弘願造八百四萬舍利寶塔」的含義 ——武則天與阿育王

《大雲經疏》記載，儀鳳年間舍利頒布之前，武則天發願造「八百四萬舍利寶塔」。前輩學者對此僅說是基於阿育王建立八萬四千塔的傳說，而沒有更多討論。Antonino Forte（富安敦）先生將敦煌寫本《大雲經疏》全文做了詳細校注並英譯，可是對於八百四萬此一數目為何被採用，僅在註解中表示無從得知。⁴²

在探討「八百四萬」的含義之前，需要注意的是《大雲經疏》的文本性質。一般以為此疏於武周革命前夕的載初元年（690）成書，並制頒天下，其目的乃為身為女性的武則天提供登基的正統性，故而此書恣意發揮，內容充滿大量詭辯和曲解的符讖之說。惟我們不應以其內容荒誕就逕將之全盤否定，反而正因為是一種符讖之書，足可見其內容對武周革命而言具有重要意義。此疏之所以將已發生的事件巧妙編入其中，是為增添其預言之可信；⁴³而值得注意者，在撰述之同時仍在籌備階段的計劃亦然，從預言書的特性來看，這些計劃都是計算好必定實現之事。自不待言，其中的核心計劃就是武則天革命稱帝，改唐為周。總之，《大雲經疏》包含的內容，即可分為以下兩種：

（一）成疏之前已經發生的事

（二）成疏之後預定實施的事

那麼，《大雲經疏》載：「神皇先發弘願，造八百四萬舍利寶塔，以光宅坊中所得舍利分布於四天下」如何解釋呢？

如前所述，陳金華先生以為是武則天前世所發預言，然而將「先」字作「前世」解，恐有些牽強，並不妥適。不若高瀨先生所說，在光宅坊所得舍利頒布之先，武后現世就「立誓拯救衆生」，發願造八百四萬舍利塔，更為允當。然而是否真如其所發誓願，營建了多達八百四萬座舍利塔，因資料缺乏，尚無法考證。對於武則天發願造塔一說的真偽，可以考慮兩種可能性：一是事實，二是撰述《大雲經疏》之際所捏造。以後者而言，撰述《大雲經疏》，是在儀鳳年間頒布舍利之後已過了十多年的載初元年，因此書中所載發願造塔之說，可能不是直接反映儀鳳年間所以頒布舍利的原意，而是說明了武周革命前夕，武則天及其推戴者利用此事並為之賦予某種含義。雖

⁴² Antonino Fort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2nd ed., p. 279, note 125. 假如這一數目為「八百四十萬」則恰好是阿育王所建塔的一百倍，因此我們似乎可以推測遺漏「十」字的可能性。可是，由於現存的寫本 S.2658 和 S.6502 均寫為「八百四萬」，如此推斷遂難以成立。因此目前無法得知算出這一數目的根據。同樣，儀鳳年間所頒布的舍利數量為各四十九粒，這也應該有某種根據，但尚未闡明。

⁴³ 拙稿〈則天武后的明堂と嵩山封禪——《大雲經疏》S.6502 を中心に〉，氣賀澤保規編，《隋唐洛陽と東アジア——洛陽學の新地平》（京都：法藏館，2020），頁 279-305。

然目前無法判斷上述兩種可能性的哪一個較合適，但發願造塔之數為「八百四萬」是毋庸置疑的。此數應非毫無意義，必有某種考量在其中。若然，其含義為何？

如上所述，對於「弘願造八百四萬舍利寶塔」之句，陳金華先生認為這明顯是根據阿育王造塔八萬四千的故事，但武則天更富雄心，其發願造塔之數近百倍於傳說。⁴⁴而肥田路美先生則認為，武則天將長安光宅坊所發現之佛舍利頒布於諸州府，與隋文帝建造仁壽舍利塔一樣，都是「皇帝將自己與作為佛教史上理想帝王形象的阿育王看齊，在一統帝國疆土、大顯天威之時，亦將禮拜舍利即得功德之機會賜予轄下百姓，此舉蘊含強烈之『向天下宣揚尊崇佛法乃實現真正的王道』此一理念」。⁴⁵高瀨先生亦與肥田先生見解相同，認為武則天此舉在模仿阿育王。她寫道：「憑藉發現佛舍利此一祥瑞，實際執政的武則天為了提升其統治的正統性，又通過直接頒布舍利於諸州之舉措，弘揚其威德，此意圖乃為模仿同樣曾頒布舍利的阿育王」。⁴⁶

毋庸贅言，阿育王是西元前三世紀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王，在佛教中視作理想君王的原型，即轉輪聖王。傳說阿育王驅使鬼神建造了八萬四千舍利塔，其中大約二十座據傳位在中國；⁴⁷這些舍利塔因作為阿育王塔而在中土受到特別推崇。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轉輪聖王分為金、銀、銅、鐵四者，阿育王是其中位階最低的鐵輪王。

梁高祖（武帝）〈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又牙像詔）〉（《廣弘明集》卷一五）載：

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車，老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舍利佛髮爪。

阿育，鐵輪王也。王閻浮一天下，一日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其一焉。⁴⁸

由此可知，在四大部洲之中，阿育王只是統治南閻浮提一部洲的鐵輪王。在唐代西明寺釋玄奘〈禪林妙記前集序〉（《廣弘明集》卷二〇）中也有同樣的記載：

⁴⁴ Chen Jinhua, *Monks and Monarchs, Kinship and Kingship: Tanqian in Sui Buddhism and Politics*, pp. 127-128. 富安敦先生翻譯《大雲經疏》全文並加以注釋，指出尚不清楚其中所記八百四萬這個數目是否有特別的含義。Antonino Fort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2nd ed., p. 279, note 125.

⁴⁵ 肥田路美，〈七・八世紀の佛教美術に見る唐と日本、新羅の關係の一斷面〉，《日本史研究》615（2013）：66。

⁴⁶ 高瀨奈津子，〈則天武后による儀鳳の舍利頒布—山西潞州の梵境寺儀鳳三年舍利塔銘をてがかりに—〉，頁180。

⁴⁷ 唐道宣《廣弘明集》卷一五共列舉十九座；《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上列舉如下二十餘座，如：1. 西晉會稽鄞塔、2. 東晉金陵長干塔、3. 石趙青州東城塔、4. 姚秦河東蒲坂塔、5. 周岐州岐山南塔、6. 周瓜州城東古塔、7. 周沙州城內大乘寺塔、8. 周洛州故都西塔、9. 周涼州姑臧縣塔、10. 周甘州刪丹縣塔、11. 周晉州霍山南塔、12. 齊代州城東古塔、13. 隋益州福感寺塔、14. 隋益州晉源縣塔、15. 隋鄭州超化寺塔、16. 隋懷州妙樂寺塔、17. 隋并州淨明寺塔、18. 隋并州榆社縣塔、19. 隋魏州臨黃縣塔、20. 雜明神州山川藏寶等（滄州長河中塔、齊州臨邑縣東觀塔、高麗遼東城傍塔、坊州玉華宮寺南塔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八亦有同樣記載。參見村田治郎，〈中國の阿育王塔（1）〉，《佛教藝術》114（1977）：3-18；藤善真澄，〈中國舍利塔緣起〉，大阪府近つ飛鳥博物館，《莊嚴：飛鳥・白鳳 佛のインテリア》（大阪：大阪府近つ飛鳥博物館，2001），頁7-26；小泉惠英，〈中國佛教美術史にみる阿育王信仰〉，東京國立博物館、朝日新聞社編，《中國國寶展》（東京：朝日新聞社，2004），頁240-248。

⁴⁸ 《大正藏》第52冊，頁203下。

一百年外有鐵輪王，字阿輸柯，亦名阿育。役御神鬼，於一日中天上人間造八萬四千舍利寶塔。其佛遺物衣鉢杖等，及諸舍利神變非一。⁴⁹

此外，《釋迦方志》中亦有類似記述：

佛滅度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有鐵輪王。統閻浮提，收佛靈骨，役使鬼神，一億人家為起一塔。四海之內，合起八萬四千。故此九州之地，並有遺塔，云「是育王所造。」當此周厲王之時。故塔興周世經二十餘王。⁵⁰

《梁書》卷五四〈扶南國傳〉及《南史》卷七八〈扶南國傳〉中，也收錄了相同的記載：

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⁵¹

與此對照，眾所周知，武則天自稱金輪聖王。關於她的尊號之變遷，據《資治通鑑》卷二〇四至卷二〇七，略作下表。

時期	尊號
垂拱四年五月乙亥（688年6月）〔加尊號〕	聖母神皇
天授元年九月乙酉（690年10月）〔上尊號〕 天授二年正月癸酉朔（690年12月）〔始受尊號〕	聖神皇帝
長壽二年九月乙未（693年10月）〔受尊號〕	金輪聖神皇帝
延載元年五月甲午（694年6月）〔受尊號〕	越古金輪聖神皇帝
證聖元年正月辛巳朔（694年11月）〔加號〕	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
證聖元年二月甲子（695年3月） 〔去「慈氏越古」之號〕	金輪聖神皇帝
天冊萬歲元年九月甲寅（695年10月）〔加號〕	天冊金輪大聖皇帝
久視元年五月癸丑（700年5月） 〔去「天冊金輪大聖」之號〕	聖 ⁵² 神皇帝
神龍元年正月丁未（705年2月）〔尊號曰〕	則天大聖皇帝

⁴⁹ 《大正藏》第52冊，頁245下。

⁵⁰ 《大正藏》第51冊，頁970中。《法苑珠林》卷一二（《大正藏》第53冊，頁378中-379上）亦有同樣記載。

⁵¹ 《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五四，〈扶南國傳〉，頁790；《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七八，〈扶南國傳〉，頁1954。

⁵²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載：「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輪大聖之號。」（北京：中華書局，1956，頁6546）據此，改元為久視的同時去掉了「天冊金輪大聖」之號，那麼武則天的尊號就變為「神皇帝」，可疑，在此暫改為「聖神皇帝」。

武則天冠以尊號「金輪」，是在長壽二年九月之後，但有趣的是，附會武則天為金輪聖王之說，早在《大雲經疏》中就已經出現。《大雲經疏》第358行至第359行載：

問曰：「金輪王馭四天下，靈感寔繁。神皇化迹閭浮，未知有何祥瑞。」

為答覆此問，接著列舉天體現象之祥瑞，將之全視為武則天成為金輪聖王的應驗。因此，武則天即金輪聖王的說法，出現於載初元年之前。

行文至此，我們重新回到「弘願造八百四萬舍利寶塔」這句。陳金華先生曾指出，這是根據阿育王建立八萬四千塔的傳說，而其數量增加到大約一百倍。但這只是論其數量，不論其含義。肥田先生和高瀨先生並不關注數量多寡，而認為武則天頒布舍利是效仿阿育王的行為。但是與作為鐵輪王的阿育王相比，武則天是為更加優越的金輪王。因此，《大雲經疏》記載武則天於頒布舍利之前發願造八百四萬舍利塔，顯然是為了凸顯其優越性。而「神皇先發弘願造八百四萬舍利寶塔，以光宅坊中所得舍利分布於四天下」稱武則天頒布舍利的範圍，為金輪王統治的「四天下」，亦可佐證。

五、結語

儀鳳二年在長安光宅坊所發現的佛舍利，在武則天的授意下頒布於在京寺院和諸州府，各地在儀鳳三年四月八日舉行瘞埋儀式。儀鳳年間頒布舍利的事實，通過西安碑林博物館所藏〈佛堂銘并序〉進一步得以確認。

當時的州府數已超過三百五十以上之多，⁵³如同潞州，各州府也應當將佛舍利安置在當地的代表性寺院。關於在京寺院的數目，開元十年（722）韋述撰《兩京新記》卷二〈京城〉載：「街東西各五十四坊，其中有折衝府四，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四」，由此可知，當時的長安共有八十八座佛寺，可供參考。隋文帝曾經在仁壽元年、二年、四年共三次，將舍利頒布於全國一百一十一所並建造佛塔，⁵⁴被視為儀鳳年間舍利頒布的先例。與此相比，武則天在儀鳳年間的舍利頒布，如潞州之例，並沒

⁵³ 關於高宗時期的州府數目無從得知，但其先後有如下記載。《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載：「至（貞觀）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至十四年平高昌，又增二州六縣」（頁1384）。日本寶龜十年（779）淡海三船撰《唐大和上東征傳》載：「昔光州道岸律師，命世挺生，天下四百餘州，以為受戒之主」，道岸律師在中宗朝備受推崇，可見該時期設有四百餘州。雖然《唐大和上東征傳》一卷是日本人所撰，可是這部傳記是依據隨鑑真一同渡日的唐僧思託所撰之《大唐傳戒師僧名記大和上鑑真傳》三卷而編寫的，因此上述州數應當可信。

⁵⁴ 關於隋文帝的建塔數量，參見大島幸代、萬納惠介，〈隋仁壽舍利塔研究序說〉，《奈良美術研究》12（2012）：85-113。

有新建舍利塔，而是在既有的佛塔舉行埋納儀式，惟其頒布的對象增至仁壽年間的四倍以上，其範圍也包羅全國各地，極為顯著。因此，這毫無疑問是唐代前期的重大佛教事件。

敦煌寫本 S.2658 與 S.6502《大雲經疏》記錄了儀鳳年間的舍利頒布事件，並解釋此舉乃按武則天「造八百四萬舍利寶塔」之宏願而為。此意圖不在以武則天比擬阿育王，反而相較被視為鐵輪王的阿育王，身為轉輪王中最高級別之金輪王的武則天更顯優越。於此同時，《大雲經疏》還稱「彌勒者即神皇應也」，說明武則天即為彌勒，⁵⁵由此觀之，武則天被塑造為同時具有金輪王與彌勒的身分，其地位遠超阿育王，毋庸置疑。

儀鳳年間，天下諸州府從中央拜領光宅坊感得的舍利，復又於載初元年領受《大雲經疏》。⁵⁶緊接著武周革唐，天授元年十月，下敕長安、洛陽兩京與各州府都要設置大雲寺，收藏《大雲經》，並讓僧人登座講解。⁵⁷如此一來，通過中央到地方的屢次宣傳，武則天的形象傳布至帝國轄下的各角落。

⁵⁵ 關於武則天與彌勒佛之間的關係，見拙著《唐代佛教美術史論攷》（京都：法藏館，2017），第三部「則天武后期の佛教政策と佛教美術」，頁 297-408。

⁵⁶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載初元年七月條載：「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頁 6466），其中「大雲經四卷」，富安敦先生認為是「大雲經疏四卷」之誤。見アントニー・フォルテ，〈《大雲經疏》をめぐって〉，《講座敦煌 7 敦煌と中國佛教》。可是，如筆者在另文已指出〈拙稿〈則天武后と佛教〉，收入肥田路美責任編集，《アジア佛教美術論集 東アジア II 隋・唐》〔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19〕，頁 439，注 36〕，滋野井恬先生認為敦煌寫本《大雲經疏》兩件的原來分量是一部一卷，篇幅大約十數張紙而已，據此上文不宜改為「大雲經疏四卷」。參見滋野井恬，〈敦煌本《大雲經疏》の研究〉，頁 836-841。另一方面，《大方等無想經》（即《大雲經》）現僅存六卷，後續部分缺損，亦不可符合「四卷」之數。雖然，據《大雲經疏》的內容與其中所用之武后新字可見，該疏撰於載初元年當無疑義。何況《大雲經疏》扮演了武周革命的符識，故於載初元年革命前夕將之頒布天下諸州，極為合理。

⁵⁷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天授元年十月條載：「壬申，勅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頁 6469）。